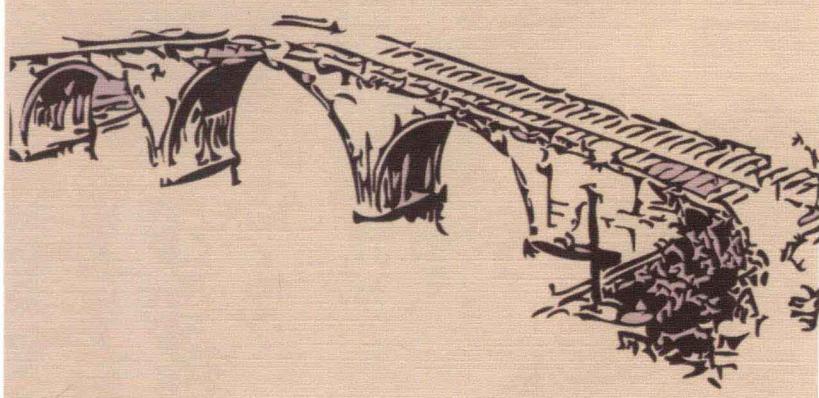


古代散文史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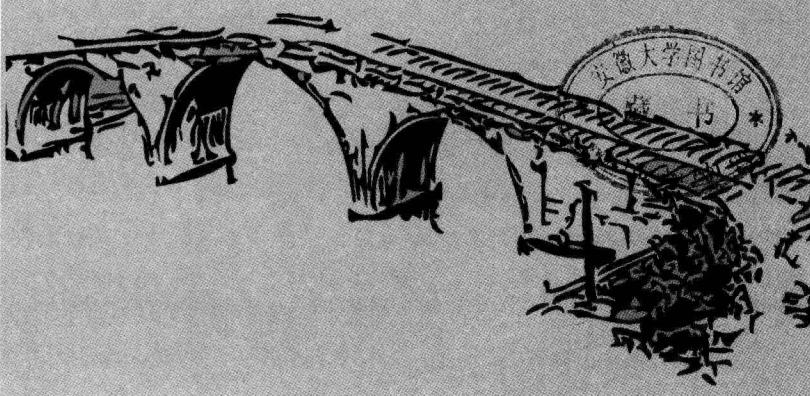
欧明俊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古代散文史论

欧明俊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古代散文史论/欧明俊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3.5
ISBN 978 - 7 - 5426 - 4050 - 5

I. ①古… II. ①欧… III. ①古典散文-文学史-中国
IV. ①1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4643 号

古代散文史论

著 者 / 欧明俊

责任编辑 / 彭毅文

装帧设计 / 乔晓辰

监 制 / 任中伟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

网 址 / www.sjpc1932.com

邮购电话 / 021 - 24175971

印 刷 / 上海惠顿实业公司印刷部

版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 × 1000 1/16

字 数 / 270 千字

印 张 / 15.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4050 - 5/I · 668

定 价 / 45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:021 - 56475597

引　　言

中国古代文人多以“文”、“文章”、“古文”、“古文辞”、“辞章”（词章），“文辞”（文词）指称“散文”，只是偶尔使用“散文”这一概念，古代没有任何一部以“散文”命名的理论著作。笔者主张以“古代文章”概念代替“古代散文”概念，将写专文详细论证，此处仍用通行的“古代散文”概念。

古代“散文”有不同层次的含义：狭义的只指古文或“散体文”，与骈文相对；最广义的与韵文相对，包括一切种类与形式的非韵文，当然包括骈文；散文还特指“辞章”，是有文采之文，近于现代“纯文学”意义上的散文。这几种概念往往并行不悖，笔者主张用广义散文概念。中国古代散文学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，广义的指研究与韵文相对的一切非韵文文体有关的一切学问，而狭义的则指散文批评、散文研究、散文研究之研究，此处用广义散文学概念。本书稿既是古代散文作品史的研究，又是古代散文理论史的研究，不求面面俱到，是以板块和专题形式，集中于散文史上一些重要概念、重要命题、经典作品、特色文类文体、影响与接受等方面系统的深入探讨及研究之反思，既重“史”，又重“论”，故名《古代散文史论》。

全书共分五章即五大板块。第一章《古代散文概念辨析及研究之反思》，对古人各种散文界说进行整体梳理和总检讨，论述了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与传统的关系，并反思对古代散文概念的“前理解”。注重在“历史语境”中评价其得失，努力澄清长期以来一些模糊认识，将此方面研究向纵深处推进。

古人对散文（广义散文）的种种界说，有必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检讨。古人界说散文，多指散文的本质。有以内容为本位，载道本位或抒情本位，还有说理本位、叙事本位、“致治”本位等。有以技艺为本位，同重技艺，或神气本位，或趣味韵本位，或语言艺术本位，或自然本位，或意境本位，或法本位，或创新本位。有论者综合诸说，追求更为合理的散文界说。散文具有“形而上”、“形而下”之分，“形而上”者是散文之“道”，是本质、精神和灵魂；“形而下”者是散文之“艺”（技术），是技术层面。以上是本体论，还有以作者本位、本原本位、功能本位界说散文本质的。散文的本质界说，追求一种审美理想，表达一种文化情怀。散文的定义，为是非真假判断；散文的本质界说，是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。古代散文

不仅是“文学文体”，还是超越文学的“文化文体”。古代学科分类的混沌状态下，仅将散文归类为“文学”之一体，是轻贱了古代散文。古代多元的散文观，各有合理性和局限性，应宽容看待，切忌以“专制”思维视之。

近代中国社会出现了剧烈的变动，文学观念包括散文观念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。近代文学的新变即“近代性”，表现为对外来文学观念的吸纳，同时又是对古代文学观念的承接，既有“外援”，又有“内应”。我们关注外来文学观念的影响，但不能忽视传统的作用。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是由文学观念的新变决定的，是对传统的“扬弃”，外来因素只是助力。传统“大散文”、“杂散文”观念发展为现代“纯散文”观念，是一渐进过程。近代文人逐渐重视受正统散文观念轻视的抒情性和娱乐消遣功能，散文文体渐由文学中心移至边缘。“复古”、“革新”两种观念相互排斥而又相互渗透，反映出转型期文人散文观念的矛盾状态。近代散文从概念内涵、功能价值到散文语言以及文体文风各个方面，都与传统散文观念联系密切，传统观念与新观念冲突融合，渐变发展。近代散文观念新变很大程度上是桐城派古文、八股文“相激”的结果，我们应突破二元对立两极思维。近代散文观念不够成熟，一直在探索，实为进行时态，是未完成的完成时，呈现出“过渡”状态。得失利弊，经验教训，皆值得我们认真总结。

现代学者接受西方“纯文学”观念认识古代散文，许多观点已构成我们今天认识古代散文的“前理解”，带着这种“前理解”，继承中创新，学术走向繁荣。但“前理解”并不等于正确观点，有些具有片面性。“前理解”如有问题，建立于其上的结论自然不可靠。人们往往习惯于从教科书和名家名著中接受一些文学史“常识”，“前理解”正确与否，多不自觉。而这正是影响散文史研究创新的重要因素，需要冷静地进行纯学理“反思”。西方文学中，没有“骈文”概念，故没有对应的翻译。现代新文学散文是白话文，骈文“缺席”，传统中断。将古代散文理解为单纯的“散体文”，而排除骈文，十分片面。古代骈、散之争，只是“大散文”观念内部的分歧。因此，论古代散文，绝不应轻视甚至排斥骈文。传统散文观念，说理文是正宗文体，最受重视。文学不仅仅审美，还审智，认为古代散文只是纯审美、纯抒情，排斥“正宗”的说理文，显然是片面的。“纯文学”散文观念，是当下的主流散文观念，其“历史合理性”首先要承认，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。古代主流文学观念，散文的至尊地位是其他文体无法企及、无法替代的。近代引入西方“纯文学”观念，重诗歌、小说、戏剧，轻散文，颠覆了古代文体的尊卑等级秩序，古今观念正相反。彻底颠覆以说理“载道”的“古文”为文学正宗的传统散文观念，合理程度究竟有多大？很有反思的必要。当下“纯文学”观念理解古代散文，“遮蔽”了散文史上许多真相，如元明清文学，散文仍是主流，是文学正宗，小说、戏曲是非主流、非正宗。古人“大散文”观念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，自具其“历史合

理性”一面。对古人的观念，我们应具“了解之同情”，充分“体认”，给予起码的尊重。

第二章《古代散文史重要命题评议》，首次系统评议“宋文”为“一代之文学”说，重新评议散文史上的“欧苏”散文合论，反思“桐城派”之界说，并对近代域外游记进行综合论述。这些都是散文史上的大问题，老题新作或新题新作，都有研究价值，都有创新空间。

金、元以来，“唐诗宋词元曲”说一直流行，特别是经过焦循、王国维、胡适等学者的进一步阐发，文学“进化”，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”观念早已深入人心。直至今日，学界仍毫不怀疑地将“宋词”视为当然的唯一的“一代之文学”。这一命题，自有其合理性和“历史进步性”，首先应该承认并充分肯定。但从学理上看，此命题只能说具“片面的深刻”，局限性十分明显。实际上，宋代以来，正统的主流观念，多以“宋文”代表“一代之文学”，王国维、胡适以来，彻底“颠覆”传统主流“大文学”观念，“大散文”由中心文体降为边缘文体，“宋文”观念价值大减。这种观念是接受西方“纯文学”观念的“强势话语”所致，与宋人“自我评价”相差甚远，远离文学史“原生态”，“遮蔽”了文学史部分真相。现当代，宋代文学各体，散文研究最为薄弱，这与宋代散文杰出成就和“独尊”地位极不相称，也是对宋人和元明清各代重视宋文观念的不尊重。

“欧苏”之称，自宋至今，经历代文论家推崇，已成为宋代古文的专用名词。北宋末南宋初年吕本中《童蒙诗训》之《文字体式》最早并提“欧苏”，之后历代延续不断。“欧苏”代表古代杰出文人，又代表成熟柔美的宋文，是平易自然的古文典范，是古文写作的入门“舟楫”。“欧苏”又“和而不同”，表现为欧高苏低、苏高欧低、欧苏各具特色和否定欧苏四类意见。欧文纯正，苏文性灵，他们各自以其胸怀和才性，共铸宋文双璧，显示“不同”魅力，凝成“和”之力量，有力延续古今之文的气脉。

桐城“古文”派、桐城“散文”派，皆有特定内涵，理解上因人而异。桐城“散文”派应称作桐城“古文”派更合适。“桐城派”倡导古文，但不完全排斥骈文、八股时文。“桐城派”首先是一个“学术”流派，应称作桐城“学派”，这是其“原生态”内涵。姚鼐是站在学术立场创立“桐城派”的，仅将“桐城派”理解为“文学”流派，是“误读”了姚鼐，看轻了姚鼐，也看轻了“桐城派”。“桐城派”本无所谓“派”，是姚鼐刻意“拟构”的，“桐城派”的历史也是“层累”地“追认”的历史。广义“桐城派”包括“桐城派”自身、“桐城派”的渊源和“后桐城派”，狭义“桐城派”仅特指“桐城派”自身。界说“桐城派”，应有内在规定性，“桐城派”的内质，就是用规范、正宗的古文阐发宣扬并践行程朱理学。

近代域外游记对近、现代中国的政治、文化影响是深刻的，也有很高的文学

价值。遗憾的是,直到今日,并未得到文学研究者的充分重视。因近代域外游记的文学性被极强的政治性、功利性所“遮蔽”,一般目录学著作又著录在“史部·地理”类,也“遮蔽”了文学研究者的视线。这是一座丰富的文学宝藏,亟待人们去开掘、赏识,拓展近代文学和旅游文学研究新领域。游记作者用传统的审美眼光观照体味西方山水,用的是熟悉的语言,创造出的是熟悉的意境,读来别具韵味。近代域外游记既有别于传统古文的载道教化,也不同于传统小品的娱乐消遣。它首先是经世文章,有很强的政治性、现实性、功利性,作者在观念上也多视为“文章”而不是“纯文学”。它本质上是西方文明记,是报告文学,山水景物仅是偶尔及之。它继承了历代游记包括历代域外游记的传统,在时代风气的感召下大胆创新,独创了政治性、宣传性、知识性、议论化、审美化等特色,是传统游记文学在近代开出的奇葩,是传统古文在近代长出的新枝,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封闭的纵向发展体系的束缚,面向世界,大胆汲取,是对传统文学观念的超越。对近现代文学观念、文体观念、文学语言以及思想启蒙、国人心态的影响都是巨大的,更直接影响了现当代海外游记创作。

第三章《古代散文经典论》,论述了散文史上的经典韩愈的《毛颖传》、柳宗元的“永州八记”、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,或论传播与接受,或进行文化解读,还挖掘了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的文学价值。经典作品研究是永远不会过时的论题,变换视角看研究对象,总会有新感觉、新收获。

《毛颖传》是韩愈另类于其“载道”文的一篇奇文,也另类于一般传记文体,后世仿作颇多,其中很多“元素”也影响深远。历代对《毛颖传》的评价,低至“文章之甚纰缪者”,高至“千古奇文”,价值增减高下,因时因人而异。《毛颖传》文体特色、结构意蕴是学者关注重心所在。储欣评曰“以史为戏,巧夺天工”,简约而深刻地揭示了《毛颖传》的艺术魅力。

柳宗元的“永州八记”确立了山水游记散文的写作范式,开创了山水游记散文的新纪元,成就巨大,影响深远,历代研究者几乎异口同声地给予高度评价。论者从不同角度对“永州八记”做了准确细微的解读,其中多创造性的积极“误读”,挖掘和丰富了“永州八记”的文学及文化内涵。“永州八记”的价值一方面是其自身固有的,另一方面则是由历代评论家的评论“层累”地造成的。因此,我们既要充分肯定“永州八记”本身的价值,又要充分肯定历代评论家的智慧识见。也有论者对“永州八记”做了消极的“误读”,我们也要批判性接受。

历代论者多从艺术性方面称赏欧阳修的《秋声赋》,而对其中丰富的文化意蕴分析不够。实际上,《秋声赋》不仅仅是一篇纯美的文学作品,它更是一篇优秀的典型的“文化散文”,深含文化信息。若读不出其中的“文化味”,便谈不上真正读懂《秋声赋》,也是对其价值的轻视。有鉴于此,笔者不做常规的艺术分析和审

美鉴赏,只重点解读其文化意蕴。《秋声赋》由自然之秋写生理之秋,更是人生之秋、心理之秋,是作者宦海沉浮、饱经忧患的人生感叹,是疲惫心灵的倾诉。《秋声赋》是悲秋赋,更是伤心赋,是典型的“心境”文学,写出个人感伤的“心境”和“意绪”,更写出时代的感伤“精神”。秋、西、金、商、白、夜、刑、杀、忧、悲、衰、老、病、退、消极,皆属“阴”,《秋声赋》是典型的“阴文化”散文。

陆游的《老学庵笔记》历来受到好评,但人们多关注它的史料价值,而轻视其文学价值。实际上,它是一部优秀的笔记体散文集和小说集。作者花费大量笔墨写人叙事,刻画了一些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,描写奇闻异事,涉笔成趣,说理议论,识见深刻,间亦写景抒情,展示出作者丰富的情感和深刻的识见。语言上,或生动传神,或简洁精炼,或自然平淡,或诙谐趣味,或平实严谨。采用了比喻、对比、对偶、排比等修辞手法,增强了艺术感染力。我们在肯定其史料价值的同时,应充分重视其文学价值。

第四章《晚明小品论》专论晚明小品文及其理论。笔者强调,正宗严肃的“古文”,只是古代散文中的一类,要充分重视,但不能忽视非正宗的“小品”美文。古代散文史,是“古文”史,也是“小品”美文史,两者兼重,才是完整的古代散文史。晚明是小品文的兴盛期,成就突出,小品理论亦放出异彩,有独特的理论价值。晚明小品的概念辨析、文化资源、影响史和评论史,皆值得重视并重新评价。

论晚明小品,首先要明确“小品”概念。研究者的视野多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“小品”观念的限制,思路跟着林语堂、周作人等人走,以为“小品”即“小品文”、“小品散文”,这种理解是片面的。小品是散文的一体,是现代文体概念。其实,晚明人心目中的“小品”并不只是指文学,更不是专指散文。今人多以为晚明小品即小品散文,是无视晚明小品的实际。从文体上看,晚明小品包含的体裁非常丰富,几乎囊括了除通俗文学(白话小说、散曲、杂剧、传奇)以外的所有文体。晚明人的“小品”文体概念是:“小品”不只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学,园艺类、谱录类、书画类也属小品。“小品文”的“文”应指广义的“文”、文章的“文”,不是散文的“文”。“小品文”是各类各体小品的统称。狭义的“小品文”可指小品散文,与它对应的概念应是小品赋、小品诗、小品词甚至小品画。各类小品即文学、艺术、谱录诸类中,以文学为主。文学类中,以散文体为主,包括正宗散文各体和笔记体。笔记体小品在晚明散文体小品中所占比重很大,最能代表晚明小品的特色,各种小品选本,多仅选序、跋、传、尺牍、游记诸体,“曲解”了晚明小品的体裁。严格地说来,晚明人不是把小品视作一种文体,而是一种文类,是清雅闲逸、韵趣俱佳的文字。晚明“小品”是一种时尚,“小品”意识渗透到文学、艺术以及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,是处皆见“小品”,这是晚明小品文体的真实面目。

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。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、生活情趣,

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、简易、新奇、独抒性灵、自然而然，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。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。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“小品”化。

晚明小品的“批判”史，亦值得系统梳理评价。以四库馆臣为代表的正统文人多“肢解”、“误读”晚明小品，所论多以偏概全，以政治评判、道德评判代替审美评价，甚至以詈骂代替批评，许多不是真正的文学批评。正统文人站在“文统”立场，维护“古文”文体的“纯洁”性，批评晚明小品“破律而坏度”，是“伪体”。论者从小品作者、题材、主题、风格、语言、手法等方面，进行“全方位”的“批判”。现代，周作人、林语堂等彻底“颠覆”正统文人对晚明小品的“批判”，自有其“历史合理性”，但过分“美化”晚明小品，必然造成新的流弊。左翼作家主要从政治思想上“批判”晚明小品，以新的“载道”观念要求“言志”的小品，是“非文学”性批评，亦有必要反思。同是晚明小品，历代论者多全盘否定或肯定，两极思维，绝对化，皆十分偏激。我们应从学理上客观、辩证地评价晚明小品。

以清初小品名家王晫为个案，可看出晚明小品在清初的真实影响。王晫的小品承晚明小品之余，静态地看，闲雅有趣，自有认识和欣赏价值。从中可看出清初文人的文化心态、人格特征以及文坛风尚。与晚明小品相较，王晫小品格调品位已有所降低，但比盛行不衰的香艳小品还要稍胜一筹。与同时代小品名家相较，也只有他与张潮等少数几人略有成就，余则不足道矣。王晫小品在明清小品中也应占一席之地。

第五章《现代名家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》，是笔者古今贯通研究的尝试。现代学术研究专业分工过细，长期以来，古代文学、现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各自为阵，壁垒森严，人为地将历史割断。由于研究视野的局限，对许多问题，一些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在封闭自足的圈子里静态思考和评价，难免模糊、片面。笔者力图打破文学史研究的古今壁垒，将现代散文理论置于中国文学、文学理论发展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中加以考察，视其为历史发展链中的重要一环和时段，评价其历史价值和地位，进而总结现代散文理论的民族特色，总结经验教训。从古代文学研究立场看，即是研究古代散文理论对现代散文理论的影响。兹选取林语堂、阿英、俞平伯三位散文理论家，梳理他们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。

林语堂小品理论对古代小品理论及文学、思想文化资源，从体制特征、体裁、题材、内质精神、风格、语言、笔法、功能等，是多方位的接受。林语堂崇尚“旁门左道”思想，正是古代小品思想的直接承继。叛逆精神、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，解构正统和经典，把李贽、屠隆、袁宏道、金圣叹、李渔、袁枚等有“异端”思想的叛逆性人物都“挖掘”出来，作为自己的精神向导，以传统中的“旁支”反对传统中的“正统”，以“反对派”和“挑战者”的姿态反抗传统正统思想和现行社会制度，这种

角色承担和角度定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。林语堂小品理论的渊源是多元的，大体上有三部分组成，一是理论自身的渊源，二是创作和作品渊源，三是思想文化渊源。主要接受“言志”文学的影响，还接受“载道”文学的影响，只是未必“自觉”而已。不只是学习笔记小品，也不只是学习小品散文，实际上是众体皆学。不只是学习晚明，也不只是公安、竟陵，更不只是袁中郎，实际上是先秦、魏晋、宋代和清代，历代皆学，近代小品及其理论则是林语堂小品理论的直接源头。思想文化上则儒家元典哲学、宋明理学、心学、佛禅哲学、道家哲学皆一并学习。因此，要全面认识林语堂现代小品理论的渊源，切勿局限于小品理论本身。还应强调指出，林语堂小品理论对小品渊源的追溯，是以文化保守者的姿态纠正前此对传统文化大冲击、大批判造成的偏颇，是对文化“断裂”的再度“续接”和“重构”，其思想文化价值是值得充分重视的。

阿英、俞平伯皆注重吸纳古典文学及古代思想文化的资源，构建自己的散文理论体系。阿英注重古代文学作品的社会性与时代性；挖掘古典文学的阶级性，对“有闲阶级”、“知识阶级”，前期持批判态度，后期评价较客观；对古人“闲适”之文，前后态度不一；赞赏古代作品的趣味性，推崇“悲”，讲究“滑稽”、“幽默”，追求“讽刺”，提倡“高级趣味”。他接受袁宏道、张岱等人有关散文形式的观念，坚持内容决定形式，崇尚自由随意；要求语言通俗晓畅、简洁朴质、新旧调和；讲究风格的多样化。他重视散文的思想性，批判地继承传统思想。阿英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，主要来自晚明和近代，并注意文化思想的新旧融合，对现代散文理论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。俞平伯反对“载道”，提倡“言志”，强调“真”；重视“玩”与“省”的功能；推崇“闲谈”、“闲适”，讲究“趣味”和“风致”；要求无意为文，寓“法”于“无法”中，追求“明清厚远”之境，不受文体形式的限制。他推崇传统非主流思想文化。其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，主要来自六朝和晚明。在西方文学理论畅行的强势语境中，他重视传统，理论“旧”而“新”，值得肯定。

笔者近年来的学术兴奋点是带着比较自觉的“问题意识”探讨古代散文史上的重要问题，既重作品研究，又重理论研究；既重史的动态描述，又重静态的综合分析；既重微观、个案研究，又重宏观、整体理论概括；既重史料挖掘，又重新的理论方法；既重文本本身解读，又重传播与接受研究；既重文学研究，又重文化研究；既重客观描述，又重主观创造性评价。努力做到纵横结合，古今贯通，视野开阔，材料丰富，有理论深度。但笔者自知以上境界很难达到，只是表达一种学术祈求。

笔者研究古代文学史，重一“疑”字，敢疑并努力善疑，尤重在不疑处有疑。张载《张子全书》中《大学·原下》云：“在可疑处而不疑者，不曾学；学则有疑。”朱熹《朱子语类》卷十《读书法上》云：“看文字须仔细，虽是旧曾看过，重温亦须仔

细。每日可看三两段，不是于那疑处看，正须于那无疑处看，盖工夫都在那上也。”又卷十一《读书法下》云：“读书无疑者，须教有疑；有疑者，却要无疑，到这里方是长进。”又卷一百二十一《训门人九》云：“学者讲学，多是不疑其所当疑，而疑其所不当疑。不疑其所当疑，故眼前合理会处多蹉过，疑其所不当疑，故枉费了工夫。”吾皖先贤胡适《胡适口述自传》概括张载的话，曰：“为学要不疑处有疑，才是进步。”我服膺此言，引以为学问座右铭。我对学术研究的理解，就是“我有话要说”，有观点要表达。特别是重要的学术议题，我要发言，他人没说的，我说；他人说过的，我可接着说；许多人都在说的，我亦可说。在看似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，进而努力解决问题，亦是做学问的一乐。

笔者强调在学术大视野中分析和评价古代散文及其理论，而不满足于就散文论散文。本书稿所论，涉及古代散文史的诸多方面，努力反思“前理解”，修正“肢解”、“误读”，揭示被“遮蔽”的历史真相，还原散文史及散文理论史“原生态”。强调必须有强烈的“史意识”，重视在“历史语境”中认识和评价古代散文，充分尊重古人智慧，充分体认历代学者的观点，给予合理的价值定位。反思惯性思维的局限性，强调思维改变和创新是学术创新的前提。力求观念、视角、材料、方法等方面皆有新的突破，自然得出新观点。

“前理解”、“遮蔽”、“拟构”、“追认”、“层累”、“误读”、“原生态”、体认、反思、检讨、古今贯通、传播、接受等，是笔者重视的“关键词”。

附录《从新发现的 96 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》，是对日本东英寿教授新发现的 96 通欧阳修书简的及时“反应”，探讨散文大家欧阳修的日常生活，认识欧阳修的另一面，但愿附录于此不是多余的。

目录

引言 / 1

第一章 古代散文概念辨析及研究之反思 / 1

- 第一节 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 / 1
- 第二节 论近代散文观念的新变与传统 / 17
- 第三节 古代散文概念“前理解”之反思 / 29

第二章 古代散文史重要命题评议 / 37

- 第一节 “宋文”为“一代之文学”说评议 / 37
- 第二节 “欧苏”散文合论评议 / 47
- 第三节 “桐城派”界说之反思 / 56
- 第四节 近代域外游记综论 / 65

第三章 古代散文经典论 / 74

- 第一节 韩愈《毛颖传》接受史述论 / 74
- 第二节 柳宗元“永州八记”历代评价之总检讨 / 83
- 第三节 欧阳修《秋声赋》的文化解读 / 97
- 第四节 论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的文学价值 / 103

第四章 晚明小品论 / 115

- 第一节 论晚明人的“小品”观 / 115
- 第二节 易学与晚明小品 / 130
- 第三节 晚明小品“批判”史论 / 142
- 第四节 晚明小品的续余——王晫的小品 / 153

第五章 现代名家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 / 165

第一节 林语堂小品理论的古典资源 / 165

第二节 阿英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 / 178

第三节 俞平伯散文理论的古典资源 / 191

附 录 从新发现的 96 通书简看欧阳修的日常生活 / 204

引用书目 / 210

后 记 / 221

第一章 古代散文概念辨析及研究之反思

第一节 古代散文界说之总检讨

此处所谓“古代散文界说”，是指古人对散文的界说。散文之“体”，有狭义、广义之分，狭义的指体裁，是体制之体，即形式，如字句、声调等；广义的指文学、文化之体，指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一切特征，不只是形式，还有题材、主题、风格、技艺等。本书用广义散文文体概念。“检讨”指梳理、清理和评判。

现代散文观念，深受近现代西方“纯文学”观念的影响，“散文”是文体“四分法”中的一种，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并列，强调感性、抒情性、审美性、艺术性。刘经庵《中国纯文学史纲》不论散文，将散文完全排斥于“纯文学”之外。古今散文观念往往差异很大，甚至完全相反。但看文学史实际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。仅仅以“纯文学”标准认识古代散文概念是不够的，而应从传统汉语言文章的实际情况出发。

古代散文是一种独特的历史存在，古人们对散文的界说有许多真知灼见，极具理论价值，但也存在不少片面性。兹试做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检讨。

一 散文及相近概念

现代通行的是以“散文”指称古代散体文，“散文”和“散体文”是同一概念。古人只是偶尔使用“散文”这一概念，历代文论著作如陈骙的《文则》、吕祖谦的《古文关键》、王若虚的《文辨》、吴讷的《文章辨体序说》、方苞的《古文约选》等，又如“文说”、“文品”等，皆没有以“散文”概念来指称对象。古人多以“文”、“文章”、“辞章”、“文辞”、“古文”指称散文，而很少用“散文”概念。但“散文”概念已通行百年，约定俗成，故本书仍用“散文”概念指称古代散文。什么是散文或散体文？古人有不同界说。

（一）古代“散文”，有不同层次的含义，实为不同的概念

古人并不是简单地以广义、狭义“两分法”看散文。最广义的散文，与韵文相对，包括一切种类与形式的非韵文，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章。狭义的散文，只指散

体文，与骈文相对。或散文即辞章，是有文采之文，近于现代“纯文学”意义上的散文。最狭义的散文，特指说理文或叙事文、抒情文，排斥他体。这几种概念往往并行不悖。古人界说散文，有具体的语境，所指不同，内涵各异，不应简单泛泛理解。

(二) 散文与古文

“古文”，古人还表述为“散文”、“文章”、“古文辞”(古文词)、“辞章”(词章)等。古文是散文正宗，是“文统”。陈衍《散文体正名》，主张以“散文”、“散体文”取代“古文”、“古文辞”之称。^①实际上，“古文”不能简单化等同于“散文”。古人常“诗古文辞”并称，“古文辞”即多指非诗体的散文；“古文”是正宗、传统、典范，与“时文”或“今文”相对，是时间概念，更是内质界定、价值判断；“古文”又与骈文或小品相对。“古文”具有不同的内涵。

(三) 散文与骈文

正统文人以“古文”(散体文)为文章正宗，排斥骈文。作为桐城古文理论的“反拨”，阮元《文言说》承继了六朝“有韵为文，无韵为笔”的观念，主张“文”须排偶对仗，有声韵，否则就是“直言之言，论难之语”。^②阮元认为，与散文相对，骈文才是真正的“文”，而无韵散行者只是“笔”，将散文排除于“文”外。刘师培《广阮氏文言说》承阮元观点，力倡韵偶之文，主张以“藻饰”、“对偶”、“声律”为“文”之标准，强调“‘文’以‘藻绩成章’为本训”，“就应对言，则直言为言，论难为语，修词者始为文。文也者，别乎鄙词俚语者也”。^③刘氏将“文”与“言”、“语”分别开来，认为“文”才是真正的文学，排除“鄙词俚语者”，也就是不承认通俗文的价值。

刘开主张骈散融合，不能偏废。《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》说：“夫文辞一术，体虽百变，道本同源。……故骈之与散，并派而争流，殊途而合辙。……骈中无散，则气壅而难疏；散中无骈，则辞孤而易瘠。两者但可相成，不能偏废。”^④1937年，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陈柱《中国散文史》将古代散文史描述为骈散分合演变史，“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，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，以至于变而为四六，再变而为八股。散文虽欲纯乎散，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。骈文虽欲纯乎骈，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。”^⑤

古人眼中，骈文与散文(古文)，通常是平行概念，不是统属关系。骈散之争只是大散文内部的观念之争。现代不少学者将散文等同于古文，以散文涵盖骈文，即以散文为母概念，骈文为子概念，骈文归属于散文，是不合理的。

^① 《小说月报》17卷号外，1926年。

^② 阮元著，邓经元点校《挚经室集》三集卷二，第605页，中华书局1993年版。

^③ 刘师培著，陈引驰编《刘师培中古文学论集》，第183页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。

^④ 刘开《刘孟涂集·骈体文》卷二，清道光六年姚氏聚山草堂刻本。

^⑤ 陈柱《中国散文史》，第1页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。

“散文”只是指称此类文的一种概念,可做“共名”。文学与经学分离后,散文指经、史、子、集的“集部”之文。“辞章”(词章)讲究文采、辞藻、想象、技巧,接近于现代“纯文学”意义上的散文。李商隐在《樊南甲集序》中以“古文”与“今体”对称,“古文”指散体,“今体”即指骈文,也就是“四六”。同是“散文”概念,内涵各异,要区别对待。

(四) 古代散文属于“文体”,还是“文类”?

西方文类(genre)概念,是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戏剧等体性不同的文学类型,每一文类均代表着特有的一套成规。“文体(style)”,是指某一作家或某一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文学风格。Style,一般学者译为“风格”,徐复观《〈文心雕龙〉的文体论》认为“文体”更近乎 style 的英文原意。^①中国古代的“文类”,是指文体的归类类型和具体文体的分类,标准不同,归类和分类不同。古代“文体”,类似西方的“文类”,西方的“文体(style)”,则类似中国古代的“风格”。古代广义散文,多指“文类”,不像现代散文,是“文体”。古代广义散文类下的古文、骈文,有时是文类,有时是文体,序、跋、记、论、说、铭、赞、尺牍等体式,才是具体的“文体”概念。古人论散文,有时指文类,有时则指文体,应认识清楚。

(五) 散文文体的“原生态”和“衍生态”

古代散文是流动概念,一直与时俱进。“原生态”文体,是指文体的初始形态,以后演进过程中产生新变,则称“衍生态”文体。散文有“原生态”与“衍生态”之别,“原生态”的散文,言、文一体,骈、散一体,雅、俗一体,道、艺一体,“应用性”、“文学性”一体;“衍生态”的散文,则言、文分离,骈、散分离,古(文)今(文)分离,雅、俗分离,道、艺分离,“应用性”、“文学性”分离。应动态地看待古代散文,仅将其视为“纯文学”之体,仅重“原生态”或“衍生态”,必然“遮蔽”散文史及整个文学史许多真相。

二 散文定义与本质界说

散文的定义,即回答什么是散文? 什么不是散文? 作为文体,古代散文有基本的规定性,就是不押韵,形式上不固定,否则便不是散文。诗歌即使写得再好也不是散文,这是绝对的。

古人多以诗体为参照,比较中界说散文。以押韵与否为标准,屠隆《刘子威先生澹思集序》云:“夫道之菁英为文,文之有韵为诗。”^②李东阳以有无“声律讽咏”区别诗文,《沧州诗集序》论诗云:“盖其所谓有异于文者,以其有声律讽咏,能

^① 徐复观《中国文学精神》,第 146 页,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年版。

^② 屠隆《白榆集》卷二,第 92 页,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 1977 年版。

使人反复讽咏，以畅达情思，感发志气，取类于鸟兽草木之微，而有益于名教政事之大。”^①作者《匏翁家藏集序》又云：“言之成章者为文，文之成声者则为诗，诗与文同谓之言，亦各有体，而不相乱。”^②散文就是非押韵之文。

什么是散文？什么是散文的本质？实为不同的概念，古人界说散文，多指散文的本质，可从以下几大方面看。

（一）内容本位

散文的本质界说，多从散文本身着眼，即“本体论”。回答散文是写什么的？写什么的不是散文？古人多强调立意本位，“意”是散文的生命和灵魂，仅具散文形式，不是真正的散文。萧颖士《江有归舟三章序》强调：“文也者，非云尚形似，牵比类，以局夫俪偶，放于奇靡。其于言也，必浅而乖矣。”^③吴伟业《陈百史文集序》云：“夫文者，古人以陈谟矢训、作命敷告、教世化俗者之所为，非仅以言辞为工者也。”^④

内容本位，历代论者所指不同，兹分别论之。

1. 载道本位

散文是载道之文，或者说载道的才是散文。“文载道”强调散文的内质精神，形式是其次的。按此标准，很多非载道散体文就不是真散文。

柳宗元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云：“始吾幼且少，为文章，以辞为工。及长，乃知文者以明道。”^⑤为文重在“明道”，仅仅文辞之工是不够的。韩愈《答李翊书》强调“道”是内在的，“文”是外在的，自己自觉培养醇正的“道”，“行之乎仁义之途，游之乎《诗》《书》之源，无迷其途，无绝其源，终吾身而已矣”。^⑥ 所论之“道”，主要指正统的儒家仁义学说。周敦颐在《周子通书·文辞》第二十八中正式提出“文以载道”命题，更加强调“道”的第一性，而“文”仅仅被视为一种负载工具。他说：“文，所以载道也。轮辕饰而人弗庸，徒饰也，况虚车乎！文辞，艺也；道德，实也。……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，艺焉而已。”^⑦明确重“道”而轻“艺”。孙复《答张洞书》说：“夫文者，道之用也；道者，教之本也。故文之作也，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。”^⑧朱熹强调：“道者，文之根本；文者，道之枝叶。”^⑨道与文的关

^① 李东阳著，周寅宾点校《李东阳集》第二卷《文前稿》卷五，第 72 页，岳麓书社 1985 年版。

^② 李东阳著，周寅宾点校《李东阳集》第三卷《文后稿》卷四，第 58 页，岳麓书社 1985 年版。

^③ 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《全唐诗》卷一五四，第 1597 页，中华书局 1999 年版。

^④ 吴伟业著，李学颖集评标校《吴梅村全集》卷二十七，第 655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。

^⑤ 柳宗元《柳宗元集》卷三十四，第 873 页，中华书局 1979 年版。

^⑥ 韩愈撰，马其昶校注，马茂元整理《韩昌黎文集校注》，第 170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。

^⑦ 周敦颐撰，徐洪兴导读《周子通书》，第 39 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。

^⑧ 孙复《孙明复小集》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
^⑨ 朱熹著，黎靖德编，王星贤校点《朱子语类》卷一三九，第 3319 页，中华书局 1986 年版。